

李剑林

董力三 著

史汉经济与地理著作研究

湖南地图出版社

本书为能源部电力高校

青年教师学术基金项目

序 言

在历史的星空中，曾经闪烁着两颗璀璨的史学巨星——司马迁和班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鸿篇巨制，其中弥足珍贵的是他们的经济名篇。司马迁、班固所著经济篇章有：《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汉书》中的《食货志》《地理志》《沟洫志》《货殖传》。如果把这七篇作为一个整体，不难发现，这是一部完整的西汉以前二千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史。

说它完整，是因为它记载了古代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史实，如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商品流通、货币演变、土地制度、赋税、徭役、物价、利润率、漕运、灌溉，以及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商管理措施。同时，还探讨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国家治乱与经济荣枯，土地兼并与农民起义，水利与经济发展，吏治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民情风俗，经济发展与礼义道德，等等。司、班正是通过对经济发展史实的记叙和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表述其经济思想。

正如古代经济史料和经济思想史料散见于史学及文学、哲学著作中一样，古代的地理著作一般均与史学、文学、哲学杂糅一起。如著名的古代地理著作《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而《尚书》兼史学、哲学、文学于一体；另一部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亦被认为是最早的文学作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七篇史书中的经济著作大多与地理有关。如《河渠书》和《沟洫志》，两篇皆记载了汉代的河流水系以及治黄引水等水利工程，可算作部门地理。《货殖列

传》有经济地理、文化地理的论述,《地理志》则是经济地理、政区地理、文化地理、自然地理、人口地理的综述。这些篇章,在地理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有的甚至占据重要地位,如《货殖列传》和《地理志》。

从中国传统的史学功能来看,史学,似乎主要是为了给政治家们提供“治鉴”。然而,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民,那么应该让历史文化遗产的遗泽惠及千千万万的民众。尤其象司马迁、班固的堪称史家之绝唱的经济名篇,应当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人们去欣赏司马迁所描绘的波澜壮阔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画卷,去凝视班固所展示的衰败残破的社会经济图景,从这蕴含着古人欢笑与凄苦的画图中,去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凋敝、高峰与低谷,从而对历史进行反思。

于是,我们产生了研究与探寻这些经济名篇深层内涵的欲求。历经春秋几载,终于有了这份成果。

为了将司马迁、班固在经济问题上的见解系统而全面地展示出来,我们没有袭用固有的从文章学的角度评析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模式,而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社会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学的角度来透视史料的内蕴和作者的思想。同时,为了使更多的人能读懂这些著作,力求通俗。因此,在著述此书时,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将原著的注译与作者经济思想的研究相结合,二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根据这两条原则,全书分为论述、注译两编。

论述部分主要对作者经济思想进行探讨与对史汉两书相关联的经济篇章进行比较。而关于作者的地理思想较之其经济思想,是次要的,故略而不谈。

注释是分段注释,而译文是整篇排列。注释不作考证,对一个条目有多种说法的,择善而从。因《汉书》中有些段落语句沿录《史记》,在注《汉书》篇目时不再重注,而是标明见《史记》某篇,这样可

使读者明了《汉书》与《史记》相重之处。限于篇幅,《地理志》只节选了有关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部分,其中的政区建置及人口部分省略不注。

本书所选《史记》《汉书》篇目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对个别分段与标点有改动。原文改用标准简化汉字。通假字、古今字不改,在注释中注出,论文中的引文所出现的通假字亦不改。

因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中,所以在篇目排列上将其放在第一篇,随后是《平准书》《河渠书》。

古籍研究,是一项严肃而艰辛的工作,非一蹴而就之事。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态度是严谨认真的。全书三易其稿,对词语注释仔细推敲斟酌,对地名注释反复查证核实,尽量符合“信、雅、达”的注释原则。虽然如此,舛错纰漏仍然不免,乞方家不吝赐教!

本书是能源部电力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基金资助课题。本课题的立项得到长沙电力学院领导及中文系陈其相和王德勇两位副教授的支持;中文系胡正微教授审阅了书稿;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承蒙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我国知名的思想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历史地理学家何业恒先生及谢炳庚副教授的关心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是长沙电力学院科技处和姚津津老师,从课题立项到书的出版都给予了关心和支持,深致谢忱!

本书得以梓行,全赖湖南地图出版社成云光总编、张立宪科长、雷宜逊编辑及蒋连军编辑的鼎力相助,我们感激不尽!

李剑林 董力三

1995年3月于长沙电力学院

目 录

序言

上 篇

司马迁、班固与其经济著作及经济思想之异同·····	3
善者因之	
——司马迁经济思想述论·····	12
事势之流 相激使然	
——司马迁对汉武帝财政经济变革的认识·····	36
甚哉 水之为利害也	
——司马迁的水利观及其他·····	49
食足货通	
——班固经济思想简论·····	58
刚柔缓急 音声不同 系水土之风气	
好恶取舍 动静亡常 随君上之情欲	
——从《地理志》看区域风俗文化的成因·····	72
《货殖列传》与《货殖传》的比较·····	84
《平准书》与《食货志》的比较·····	86
《河渠书》与《沟洫志》的比较·····	88
从《货殖列传》到《地理志》·····	90

下 篇

货殖列传·····	95
-----------	----

平准书.....	141
河渠书.....	189
食货志(上).....	207
食货志(下).....	254
地理志(节选).....	284
沟洫志.....	373
货殖传.....	402

附：

主要参考文献

西汉政区图

西汉时期经济都会分布图

西汉时期工商物产分布图

《河渠书》示意图

上 篇

司马迁、班固与其经济著作 及经济思想之异同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 年），卒于昭帝之初（公元前 86 年），享年约六十岁。司马迁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三十八岁时继父司马谈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作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开始撰写《史记》。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起自黄帝迄于汉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道德、法律、科技、宗教、民族、医学等。是一部体大思精、气势恢宏的历史巨著，是中国史学史上一座划时代的丰碑。

司马迁既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他在《史记》中，开创了史家记载社会经济活动的先例，写下了第一部工商业史《货殖列传》，第一部财政经济史《平准书》，第一部农田水利史《河渠书》。

《货殖列传》选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记叙了春秋末年至汉初这一历史时期的工商业发展概况，考察了物产、交通、城市、历史传统、民俗风情与工商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其独到的视觉与见地论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提出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观点。

货殖，即商品和货币的增殖。《货殖列传》中致富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从事商品买卖的专业商人，其致富手段是贱买贵卖，其货殖来源是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商业利润；另一类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实业家，其货殖来源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利润。可见“货殖”在历史上，不仅仅是指商人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货财增殖，也指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此外，还有一类是高利贷者，其货殖来源是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这类人是少数。

《平准书》选自《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以货币金融为主线，重点记载了汉初至武帝一百余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政策的演变，揭示了经济与政治、军事、法律、道德以及官制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因该篇主要载述了货币制度的变更以及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的均输、平准等政策，故名《平准书》。

《河渠书》选自《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记述了上起大禹治水，下穷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一千多年间治河凿渠的史实。它开创了历代官修正史撰述河渠水利专篇的典范，同时赋予了“水利”一词以治河、防洪、灌溉、航运等明确的专业概念，现代意义的“水利”二字当溯源于此。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和辞赋家。初续书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辨,得释。召为校书郎,管理宫廷藏书,后升兰台令史。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历20余年,修成《汉书》。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从大将军窦宪攻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擅权被杀,他受牵连,死于狱中,终年六十一。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叙事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王莽新朝灭亡(公元23年),共二百三十余年历史。全书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因循《史记》以纪传为主的体例,唯改书为志,废世家入列传,并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增《古今人表》。全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沿用《史记》原文。

《汉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史,为后来各朝正史开创了新的体例。《汉书》包举一代,叙事详赡,文辞渊雅,实为我国古代史的典范之作。

《汉书》中记载经济活动的篇名有《食货志》《地理志》《沟洫志》《货殖传》。

《食货志》选自《汉书》卷二十四

《食货志》是一篇以农业和货币为主的财政经济史。叙事上起上古,下迄西汉,是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经济专史。

《食货志》其名来自《尚书·洪范》。班固在本篇的开头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食货志》分上下两卷,食与货各自起迄。上卷主要记载土地制度、赋税变化及粮食问题;下卷主要记载历代币制的沿革以及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地理志》选自《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以全国政区为纲领，记录了各政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全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全部转录《尚书·禹贡》，记载了古代的九州划分、山岭、河流、泽薮、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

第二部分：根据《周礼·职方》，叙述了周制九州区域的划分情况及其境内主要的山岳、川泽、物产、男女、畜种和谷类。

第三部分：记述西汉的政区建置及人口，总计记载了 103 个郡（国）和所辖的 1587 个县（道、邑、侯国）。

第四部分：分别记述地域星宿分野及沿革，论述各地经济状况和民情风俗。这一部分主要辑录了西汉成帝时刘向所言的“域分”，朱赣所条的“风俗”。

《沟洫志》选自《汉书》卷二十九

《沟洫志》中战国至武帝时河渠治理开凿的史实皆沿用《史记·河渠书》。班固所续为武帝末年至王莽时期，主要记述黄河洪灾及其治理工程、治理方略、治水意见等，是这一时期治水经验的系统记录。

《货殖传》选自《汉书》卷九十一

《货殖传》主要记载了春秋至西汉 30 个商人的货殖事例，基本上移用《史记·货殖列传》，新增记了汉元帝、成帝、哀帝、王莽时 11 个商人。在此传中，班固提出了“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欲寡而事节”、“贵谊而贱利”等观点。

二

《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而班固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食货志》和《货殖传》中。两位史学家在经济思想上有共识，亦有分野。

两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人类生存需要得以满足对社会和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一角度提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经济的主张。司马迁认为，人们要求满足吃住穿等物质需要的欲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班固则认为“食足”是“生民之本”，物质财富是“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两人都把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主张治国安民在于发展和繁荣社会经济。

第二，主张农、工、商诸业分工协作。司马迁提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班固的理想是“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无废官，邑无敖民，地无旷土”，他解释了“四民”的分工：“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第三，两人都主张爱惜民力，反对奢侈。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之弊：“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他对汉武帝兴修宫室苑囿、巡游封禅而耗费民力与财力深为不满。班固在《食货志》中，赞扬汉文帝躬修节俭思安百姓，引用贾谊、晁错、董仲舒、贡禹、师丹等人的言论，以说明奢侈招致社会危机。

然而，两人更多的是分野。

1. 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两人虽主张农商并举，但各有偏向。

司马迁偏向于发展工商业：“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班固则偏向于着重发展农业：“理民之道，地著为本。”

2. 在民利与国利上，两人反其道。司马迁的著名论断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主张勿与民争利。班固则认为不可争国利，他对蜀卓氏、宛孔氏、齐刀间之辈“公擅山川铜铁渔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深表痛恶，认为“皆陷不轨奢僭之恶”。两人在民利与国利上的分歧还表现在对桑弘羊财政政策的态度的上，司马迁对桑弘羊的国家调控财政的措施有微辞，而班固却认为桑弘羊是“良吏”，对其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政策给予了肯定。

3. 在民生问题上，司马迁提倡发家致富，班固则认为首先必须满足人们起码的生存需要。所以，司马迁鼓励人们尽情地去追求财富，班固则告诫人们：“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

4. 在财富分配上，司马迁承认财富存在的客观性与必然性，主张贫富现象应听其自然，没有必要削富益贫，加以平均。班固则绝然相反，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均思想来审视与思考社会经济现象，主张取多益少，平均土地；在《食货志》中他引用孔子的话来表述其观点：“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在《叙传》中论及作《货殖传》的意图时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匱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

5. 在社会职业分工上，司马迁比较开放，虽也提倡人们“各劝其业，乐其事”，但更多地是鼓励人们因欲求利，哪一行业能赚钱即操此业，无须囿于狭小的圈子里。班固则提倡安于职守：“《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穡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

6. 在致富的手段上,司马迁将其划分为“本富”、“末富”、“奸富”上中下三等,但他对“奸富”只是认为用生命去冒险求财,故而为下,并未给予过多的非议。班固则是是非分明,他认为因田农、贩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致富以至于击钟鼎食者虽然有越法度,但他们毕竟是“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无可厚非,然而,对司马迁所说的掘冢赌博等“奸富”,他予以抨击:“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复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7. 在义利观上,两人迥异。司马迁重货殖而倡生财求利,班固崇礼义而倡贱财轻利。司马迁认为求利奔富是人的天生情性,主张因民所欲,让民求利,驱民求富,并认为利以生义,“人富而仁义附焉”。班固则认为:“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为什么有这种分野?我们必须从两人的文化观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察。

在文化观上,司马迁兼收并蓄了诸子百家学说,然后“自成一家之言”,所以他的经济思想对前哲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与创新,他冲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樊篱而极力鼓吹发展繁荣商品经济。班固则是一位典型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儒家在经济思想方面有三个突出特征:重农轻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这三点,在班固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史记》:“是非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这段话恰好映证了两人文化观上的差异:班固正统的儒家思想观和方法论;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独特个性。

此外,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司马迁处于汉初六十余年的经济放任政策与武帝经济干预政策交替的时代,汉初那种“开关梁,弛

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氛围，感染和影响了司马迁，为他在经济思想领域中独树一帜的旗帜提供了现实依据。班固所处的时代，尚在西汉末年巨大的经济波动余波的冲撞中，而产生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与贫困，呈现在班固眼前的是广大农民“衣不御寒，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所以班固认为最重要最现实的是使农民有一块土地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他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土地与足食。

尽管两人在经济思想方面有同有异，但不论是同还是异，都反映了两位史学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

在《史记》和《汉书》的研究领域，有两种倾向：扬马抑班，扬班抑马。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并不想对其中一种倾向予以认同。但每读两人经济文章，掩卷之后，其思绪更多的是沉醉于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恢宏议论与对经济现象的真实叙述中，深感其叙史是“史家之绝唱”，其为文是“无韵之离骚”，而其经济思想是闪烁在天上的一颗明亮的星，光照古今。

在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上，人们多膜拜西方，殊不知，关于开放竞争的优越性，世界上谈得最早的是中国人，这个人就是司马迁。他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鼓励自由竞争；他在《货殖列传》中也生动地描绘了汉初因经济放任政策而带来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图景，这幅图景，与今天波澜壮阔的商品经济大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西汉初一度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昙花一现。这说明一个问题，司马迁主张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理论具有必然性和超前性，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商品经济必然取代小农经济，但只有当封建的经济制度彻底崩溃的时候，商品经济才有它繁荣发